

書名：《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

著者：鄒穎文

出版：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1年2月

頁數：323頁

目前主流的香港文學研究，很少留意古典詩文，連基本文獻搜集和資料整理也十分欠缺。借一位本地文人的話說，“至今之撰香港文學史者，但知有白話散文、小說、新詩、戲劇而已，於古典詩文並其作者隻字不道”。¹ 以詩歌為例，文學史大多限於五四運動後興起的白話新詩。² 其實香港自開埠以來，古典文學（尤其是詩詞）創作從未間斷。

-
- 1 《經眼錄·何乃文序》，頁5。另見黃坤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現代文學史的撰寫者長期以來持續的排斥舊體文學，一筆抹殺，視而不見，可能是受了早期胡適及《新青年》的偏激和偏見所致。他們認為舊體文學都是落伍的，沒有生命的，沾上封建遺毒的，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但從文化學的觀點來看，新舊之間可能就有一種繼承、發展和選擇的關係，相反相成，不一定就是互相對立的。……我們更有意的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回顧這一百六十多年來香港文學所曾經走過的道路，認真研究他們有哪些內容？哪些美感的特質？哪些成就？哪些價值？這都是不容忽視的存在。”《八月的熱浪——香港舊體文學的盛會》，載黃坤堯：《香港舊體文學論集》（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8年），頁422。
- 2 例如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1997年）對詩歌的闡述以白話新詩為主，講及戰前香港新舊文學時亦只是以文言文籠統概括；頁63—66。又如潘亞暎等：《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年）研究1920年至1997年間香港文學的發展，當中亦只論述新詩，連論及香港“舊文學”的片段都只集中於對文言文章的批評，基本上不包括詩詞。另有如張大年：《香港開埠前後的詩史——香港詩歌選》（香港：飲水書室，1997年）同時輯錄了新詩及古典詩作，並對香港古典詩的發展有少量評述，但關於詩詞的研究資料仍有限。其他如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古遠清：《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施建偉等：《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年）都未有對香港的古典文學多作討論。反而慕容羽軍由於本人寫詩詞，亦熟悉香港古典文壇人事，所以在其《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香港：普文出版社，2005年）中有一章節《徘徊於“玩”、“用”間的傳統詩詞》概論其發展及簡評部分作者；頁131—149。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鄒穎文女士於2011年出版了首本紀錄香港古典詩文資料的專著《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下稱《經眼錄》):“是書現將編者所曾經眼個人詩文集,予初步整理、著錄,以……填補過去有關香港古典詩文研究之空白。”(前言,頁9)³對於有志探索香港古典詩文乃至補全香港文學史的人來說,這部工具書無疑具有重要性。

幫助填補香港文學的空白

《經眼錄》跟其他紀錄少數香港古典詩文的書籍(如選集及紀事著作)目標不同;它是首部系統性紀錄香港古典詩文資料的專著,搜集和整理了“開埠以來共514位作者所撰808種詩文集”,其中“集內有詩者706種,有詞者383種,有文者176種,有對聯、詩鐘者85種,有曲者19種”(前言,頁9、17)。可以說,它網羅了有出版紀錄的大部分香港古典詩文作家的資料,證明香港文學史忽略詩詞是罔顧事實和不負責任。

《經眼錄》的正文採用條目形式,按作者姓名筆畫排序作檢索目錄,內文則依綱目羅列香港古典文學作品的資料。編者亦運用“前言”勾勒出香港古典詩文的發展輪廓及歷史環境,特別是對部分詩人的時代背景、其作品的內容及時代意義,以至詩社雅集對古典詩文的貢獻,作出簡要敘述,既補充正文限於體例和篇幅而未能交代的地方,亦讓讀者了解香港古典詩文是時代見證而非封建遺物,更不是只有沉溺於風花雪月的酬唱。

3 在《經眼錄》出版前,已有若干學者文人開展對香港古典詩文和作家資料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例如方寬烈《香港文壇往事》(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2010年)以散文形式記述不少香港古典詩人逸事,並有一些關於詩詞研究的篇章;何乃文等編輯《香港名家近體詩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介紹了衆多香港古典詩人及作品;黃坤堯主編的《香港舊體文學論集》收錄了衆多學者對香港詩詞的研究論文等。學術期刊方面則有如《文學論衡》,像總第五及第六期主題就開宗明義是“香港舊體文學研究專輯”,論文有如程中山《論潘飛聲〈香海集〉》、許子濱《論劉璣詩》、鄧昭祺《“修竹園”詩論》、鄭滋斌《陳湛銓〈詠史詩〉六十首初探》、黃坤堯《碩果社簡述》和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概述》等。不過這些研究多數是對個別名家的單篇討論,而《經眼錄》則是首本嘗試全面地統計記錄香港開埠以來的古典詩文及作者資料的專書,意義重大。

編者以不同統計表羅列數據，配合文字分析，力求梳理出香港古典詩文的歷史脈絡。例如“詩文集作者”列表分別以“性別”、“籍貫”、“出生年”、“來港時間”、“職業”及“在世、其他”為綱目作統計（前言，頁10—11）：“出生年”顯示514位作者中有306人生於1911年前，而“來港時間”顯示1949年前後及五十年代來香港的作者達180人，多於其他時期。由此可見香港古典詩文最活躍的時期為上世紀中、後段，而且大部分作者並非土生，印證了余少颺所說“百年以來，中原迭經變亂，香江為遷客騷人避地之所”（前言引，頁9）的香港文學的歷史背景。

除編纂資料外，編者亦在“前言”中提出對香港古典詩文的觀察，例如指出體裁上“早期詩文作者如諸太史……等較多寫古體詩，愈是近出，古體愈少，近體愈多……尤喜七律和七絕”（前言，頁17）；內容上“作者都多曾描寫香港，作品反映香港社會風貌，富其時代特色”，“紀遊詩特多”，“作者多詩書畫兼善，或與書畫界關係密切，故文集中題畫詩數量頗多”（前言，頁19—20）。編者並舉出相關資料佐證，訴說香港古典詩文的百年點滴，方便後學鑽研課題。

收錄標準不一致，導致資料疏漏

《經眼錄》列舉的條目，止於2010年出版的詩文集。⁴ 其“凡例”第一條訂明“香港作家取其廣義，舉凡香港出生、長期居港、短期旅居香港，或曾於香港受業、工作者，其居港前後之古典詩文集都一併納入”（前言，頁7）。不過仍有一些在2010年前出版且為大學及公共圖書館館藏的詩文集未被納入或列出，包括明顯的例子。

這樣的情況大致可分兩類：第一類是作家不被收錄，第二類是作家的作品未有完整地輯錄於書中。就第一類來說，已知符合條件而未被收錄的作家包

4 如頁72—73、74—75、104—105、114—115、136—137、166—167、168—169、172—173、268—269等所載均有2010年出版的條目。

括許之遠、周長忽、鄭德豐⁵及在2010年前已出版十本詩文集的蔡麗雙。⁶他們的作品大都藏於大學和公共圖書館,不存在私藏或孤本的問題。許、周、鄭的情況也許只是遺漏,但蔡氏的情況是否有個人好惡而遭剔除的可能?編者既云“工拙不論”(前言,頁9),似應收錄。

至於第二類情況,編者未有對所有作品的出版資料採用均一標準輯錄,有損資料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即以篇幅占整頁版面(即兩書頁)的文人來說,受“禮遇”的作家包括汪兆鏞、呂碧城、翁一鶴、張紉詩、陳步墀、陳伯陶、陳湛銓、曾克崙、傅靜庵、葉恭綽、廖恩燾、潘小磐、潘新安、劉景堂及饒宗頤等。他們是先輩名家,除潘新安及饒宗頤外已不在世,其作品及部分外緣性資料被詳細記錄,原不成問題。可是另有一些作家如尹家珊、林峰、陳文岩、鄭龔子等,連部分作品的基本資料也未獲記錄,遑論一致性的對待。其中林、陳、鄭的詩作均逾一千首,猶豐於汪兆鏞、陳步墀、廖恩燾及潘新安。作品的價值固然不以數量評估,而正因《經眼錄》旨在編纂而不在評價,編者有責任列出作品資料。尹、林、陳、鄭只獲介紹部分作品,其餘僅在“簡介”順帶提及,有時甚至連簡介都出現遺漏。較明顯的例子是鄭龔子,在2000年至2009年出版的十六本詩詞集中只獲介紹兩集,有十一冊書題列入“簡介”欄(頁282—283),另有三冊書名被遺漏,⁷令人有格式參差的感覺。

《經眼錄》既然充分介紹某些只有十餘或二十餘首的小集,似乎不應捨棄一些更厚實的詩集。總之,編纂和羅列資料的著作既然並非評論,更應力求科學準確性和客觀一致性。姑勿論讀者容易忽略僅在“簡介”中驚鴻一瞥的書名;更重要的是,未獲獨立條目介紹的詩文集並不收入附錄“詩文集總目”內,

5 三人都是未紀錄於《經眼錄》但為慕容羽軍介紹的“香港傳統詩人”;見其《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香港:普文出版社,2005年),頁141—149。參看許之遠:《許之遠詩詞初集》(臺北:華興書局,1991年)及《許之遠詩文別集》(臺北:華興書局,1992年);周長忽:《生活的浪花》(香港:怡和齋,2001年);鄭德豐:《象棋殘挪局詩文選》(資料不詳)及《壽引詩緣集》(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1年)。

6 此十冊為《芙蓉軒詩詞》(2004)、《愛蓮吟草》(2004)、《古韻新聲》(2005)、《澄懷觀道》(2005)、《靜照忘求》(2006)、《馳騁古今》(2006)、《縱橫乾坤》(2006)、《香江風情》(2006)、《劍龍鳴籟》(2007)、《蘭蕙清音》(2009)。

7 分別為《夏木集》(2005)、《淡影乾坤》(2009)及《莫愁湖畔》(2009)。

不但影響編者所稱 808 種詩文集的數據準確性，而且妨礙讀者檢索相關作品資料及對相關作者的公平認識。

體例內容詳略不一

《經眼錄》的資料取舍既然標準不一，條目的篇幅長度便容易不成比例，詳略失衡。例如在捨棄某些作品的基本資料之際，《經眼錄》亦選擇性詳述某些作者的生平（另一些則從略）、羅列無關作品宏旨的“題詞”者（有時一項十餘人）。又例如條目的“簡介”和“詩文約數”形式和內容標準參差：有些簡介十分詳細，除列出文集的內文標題外，更節錄自序或他人的序跋，有些則僅得聊聊數字簡述。⁸ 這種明顯差別甚至出現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介紹，如易君左的《君左詩選》（1953）及《琴意樓詞》（1959）（頁 78—79）。

其實，過分簡略的簡介對讀者檢索的幫助不大。假如《經眼錄》他日修訂再版，建議“簡介”採用大體統一的標準，包括基本資料如出版資料、作品數目、版本比較、內容概要等；其餘則可從略以精簡內文結構。特別是在同一作者名下出現書名相同或相近而出版社、出版地和出版年份有異的詩文集時，編者應說明版本的內容比對及增刪更改等情況。譬如饒宗頤《選堂詩詞集》（1978）云：“多記遊詩及題畫詩。有：一、《選堂詩存》十二章，1963 年至 1976 年撰；二、《選堂樂府》四章”，“詩：800……詞：250”；《選堂詩詞集》（1993）則說明“收錄舊刊本詩詞（參前條），並新增《選堂詩詞續集》詩四章、詞二章”，“舊版詩詞：參前條；續集詩：260；續集詞：29”（頁 294—295）。如此能讓讀者了解版本異同，避免查閱資料時產生混亂。

除“簡介”外，“詩文約數”的體例亦時見混亂。凡例中未有就詩文約數作出說明，不過既云約數，當反映編者有時無法點算作品。然而縱觀全書，大部分

8 詳者如陳漢山：《漢山詩集》（1979）約 250 字；略者如廖平子：《自怡室詩鈔乙集》（1931）僅“綫裝。自輯本。多古詩”8 字，郁增偉：《增偉詩文續集》（1999）僅“居港後作”4 字，莊如發：《兩東居吟草》（2001）僅得“有詩詞”3 字。見《經眼錄》頁 166—167、224—225、94—95、126—127。

條目均列明作品數量,方便估算作者的作品總量。相較之下,其他以約數標示作品數量的條目反覺突兀。而且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條目格式亦有別,如黃坤堯四集中首三本都列明作品數量,但出版最晚的《清懷三藁》(2011)反而只標示約數:“詩: 500+/詞: 30+”(頁196—197)。另有一些則是同一本書,不同體裁分列約數和實數,如楊圻《江山萬里廬詩詞鈔》(2003)列“詩: 1 950+/詞: 294”;2004版則為“詩: 2 350+/詞: 294 /文: 58 /聯: 63”(頁220—221),詩的數量為約數,其他均為實數。亦有“詩文約數”出現詩詞數量混合的情況,如林庚白《麗白樓自選詩》(1946):“自選詩,詩 270 /附錄,詩: 36 /詞: 7 /文: 3”;《麗白樓遺集》(1997):“詩詞: 2 700 /文: 54 /書信: 141 /日記: 1930—1933”(頁72—75),後者不分詩詞數量。體例不齊,可能是限於集中提供的資料參差,編者無暇點算所致。但這樣難免影響著作的嚴謹性和整體觀感。編者既有心提供資料,應盡可能把作品數量準確統計,方便讀者“按圖索驥,循流溯源”(前言,頁20)。

《經眼錄》的奠基意義

誠如編者指出,“由於政治地位特殊,香港過去一直是海峽兩岸最包容開放之地,南來作者創作免受政治干擾,故可保存中國詩文創作傳統,並有所發展”(前言,頁10)。⁹ 如今古文創作已少,亦未必合時宜;但白話詩却無法取代詩詞的獨特美學體驗。從過去的殖民地年代到今天,香港的詩詞創作不斷延續。那些來自香港詩人、詩文社及公開比賽的詩詞作品,都是現當代香港文學的一部分。《經眼錄》有系統地整理香港古典詩文作家和作品的資料,所得514名作家808部詩文集之數尚未包括被降入“簡介”的作品,以及無從考證、沒有出版的佚名作家,可見香港的古典詩文數量相當可觀。

《經眼錄》匯集的文學鐵證進一步說明,香港文學史必須糾正只着眼於評

9 黃坤堯:“香港文學迭經中原喪亂,時代盛衰,每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觀,不犯本位,繁花盛開,自能保持地方特色,構成主體格調。其中古典詩文尤為璀璨耀目,自由馳騁,代有英姿,傳承不絕。”《經眼錄·黃坤堯序》,頁6。

價白話文學的心態，加入論述古典詩文的內容，填補長久存在的學術空白。編者在前言中已有所示範：它勾勒出香港古典詩文的歷史發展，例如詩人以詩會友、結社為朋、師徒傳承的情況；時代高低起伏之造就作品的澎湃與滄桑；以及香港古典詩文詠史、紀遊、詩畫並蓄等特色（前言，頁18—20）。這些觀察涉及大量資料，是經年累月的消化所得，為讀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視角。時至今日，由於印刷技術提升和成本相對下降，政府支持及傳承感深化等原因，香港古典詩人也許比先賢較積極結集刊印作品。這對於未來的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無疑是有利的。

《經眼錄》較可惜的地方是體例準則及內容取捨參差，就羅列作品資料、版本比較、簡介說明等方面都有完善的空間，俾能提供更準確全面的資料。另一方面，限於篇幅及體例，只能以作者為介紹單位，未及紀錄香港詩社雅集及公開比賽的資料。不過編者已提到“期待有關詩社、報刊之古典詩文，能早日得以輯錄、整理”（前言，頁20）。詩社雅集在香港詩詞發展的歷程中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尤其是時至今日，詩社多少肩負起傳承詩詞創作的責任。這方面的資料已在書中的前言略作交代，相信亦可成為引路石。

香港古典詩文的資料目前仍未受到太多關注，值得探討的地方很多。因此《經眼錄》匯編的資料，實在是有志研究相關課題者的入門基石，讓後學可以發掘更多香港古典詩文的精神和風貌。

（作者：嶺南大學中文系研究助理 陳子康）